

《为奴十二年》中的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

向君如^{1*}, 杨月妮², 吴群涛¹

(^{1*}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²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第 86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为奴十二年》, 除了讲述黑人群体被他者化的屈辱历史, 还隐含着一种被种族化了的性别意识形态。结合他者理论分析发现, 黑人男性的传统男性气质逐渐消弭, 他们被迫赋予了过多的女性气质; 黑人女性在保持女性气质的同时, 被迫展现过多的男性气质。在美国流行文化中, 黑人性别意识形态对立白人性别意识形态, 这被用于证明黑人文化的劣等性, 从而为种族不平等制造了合理借口。因此, 黑人无需通过迎合白人父权制的性别规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但减少媒体对黑人群体同质化、刻板化的塑造是阻止白人霸权逻辑再生、实现种族平等的关键。

关键词: 《为奴十二年》; 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 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 他者化

On the Raced Gender Ideology in *12 Years a Slave*

Xiang Junru^{1*}, Yang Yueni², Wu Quntao¹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²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86th Academy Award-winning film *12 Years a Slave* not only recounts the humiliating histor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s otherization but also implicitly contains a raced gender ideology. An analysi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theory of the Other reveals that the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of African American men gradually diminishes, while they are increasingly assigned excessive feminine traits. Meanwhile, African American women, while retaining their femininity, are compelled to exhibit excessive masculine traits. In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 the raced gender ide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s is positioned in opposition to that of white Americans, serving to justify the inferiority of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reby providing a rationale for racial inequality. Therefore, African American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validate their worth by conforming to the patriarchal gender norms of white society. However, reducing the media's homogenized and stereotypical portrayals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is crucial to dismantling white supremacist logic and achieving racial equality.

Keywords: *12 Years a Slave*; raced gender ideology; masculinity; femininity; otherization

1. 引言

种族关系是美国社会的核心议题, 也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心。荣获第 86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为奴十二年》改编自非裔美国人所罗门·诺瑟普 (Solomon Northup) 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小说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 作为美国北方黑人、小提琴家, 所罗门被拐骗、继而被贩卖为奴, 在南方种植园遭受了长达十二年的奴役, 最终获得自由。影片一经上映, 就因其对黑人身体伤痕

- 80 -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文学中的男性气质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 21A0100); 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约翰·欧文<直到找到你>跨媒介叙事研究》(项目编号: XDCX2024Y112)

作者简介: 向君如 (2001-), 女, 广西梧州, 硕士, 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

杨月妮 (1999-), 女, 湖南浏阳, 博士, 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

吴群涛 (1981-), 女, 湖北武汉, 博士, 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与文化

通信作者: 向君如; 通信邮箱: 2428513616@qq.com

的直白呈现以及奴隶制对黑人的无情摧残引起了广泛热议。白人不仅制定法律和奖惩规训制度来控制黑人的身体和精神，还通过塑造一种被种族化了的性别意识形态来进一步巩固种族不平等。

黑人性别意识形态是指在后民权时代，当性别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加剧时，一种塑造黑人男性气质和黑人女性气质的系统意识形态。而黑人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把种族不平等的责任转嫁给黑人自身^[1]，以合理化白人的种族压迫。该意识形态在《为奴十二年》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了黑人群体在性别与种族交织压迫下的复杂困境。

学界对《为奴十二年》的研究成果颇丰，多聚焦种族主义、凝视、反凝视以及身份认同等议题。有学者关注到了黑人女性在性别与种族上遭受的双重压迫，但往往只是将这两种压迫简单叠加起来讨论，忽视了性别与种族的交叉性关系对黑人整体的影响。基于他者理论，剖析影片中的黑人性别意识形态，有助于厘清背后的种族压迫逻辑。

2. “他者”与后殖民批判

“他者”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就曾谈到“同者”（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到了近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自我”是认知世界的中心，而外部世界则是被客体化、被观察和被认知的对象^[2]。黑格尔通过奴隶主和奴隶的辩证关系，论证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2]。20 世纪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进一步深化阐释了“他者”概念。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批判了西方意识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分法，认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2]。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者的凝视有助于个人自我意识的塑造，但同时也意味着被凝视者被客体化、对象化^[2]。列维纳斯则从伦理学角度强调，对于自我来说他者是不可知的，他者带有一种神秘感与威胁性。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就是自我不断消化、吸收他者，不断将他者纳入自我意识的过程^[2]。

“他者”概念首先被女性主义引入，借以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2]。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他者”概念不再局限于性别领域，而是延伸到被种族主义、阶级制度等建构为他者的其他弱势群体。1978 年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标志着后殖民批评的问世，即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发难、诘问与批评、解构与重写^[3]。“他者”概念被后殖民批评广泛运用于分析帝国对殖民地的压迫。在美国的种族语境下，“他者”概念常常用于描述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群体。这种他者化的过程与东方主义中西方对东方的他者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被视为东方主义的本土化表现。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支配、重构与权威建构的一种文化模式^[4]。西方将东方塑造为一个静止、沉默的他者，只能由西方代为发声。为此，西方构建了一套表征体系、文化霸权与强势话语，以确立其对东方的解释权与支配地位^[5]。具体而言，西方通过将东方建构为“非理性、静态、懒惰、纵欲、女性化”的他者，反衬出自身“理性、进步、勤奋、克制、男性化”的优秀品质，利用这一系列二元对立巩固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西方霸权所构建的这种话语体系是与东方现实无关的“东方主义”，其本质是欧洲中心主义^[6]。

西方以“东方化东方人”为目的的“权力与知识的共谋”至今仍在持续^[5]。在电影《为奴十二年》中，这一文化霸权机制得以延续。影片通过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的塑造，将黑人再现为沉默的他者，巧妙为白人观众的道德视角服务。这正是萨义德所批判的“文化霸权”或“西方优越论”的具体表现：它并非直接宣称黑人是劣等种族，而是通过证明黑人不符合白人传统性别规范，将黑人归为不文明、不正常、不值得平等对待的群体，从而在文化层面合理化了对黑人个体的歧视与贬抑。

3. 黑人男性：被压制的男性气质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将黑白关系的逻辑拆解为：白人男性认为自己比黑人男性高等，而黑人男性则想要付出一切代价证明自己和白人男性拥有同等多的智慧，以换取认同，最终导致黑人男性生成一种自卑情结^[7]。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承认了白皮肤的优越性，并将自己与白人之间的差异视为缺陷^[7]。

在语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共同塑造下，白人和黑人之间形成了主导和附属的关系。黑人男性被凝视、物化，最后成为了阳具（penis）本身，丧失了象征意义上的性能力^[8]，成为了白人

的工具和附属品。在电影《为奴十二年》中，白人通过身份降格、尊严剔除与规训机制等手段来压制、扭曲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

黑人男性气质的压制首先是通过身份的降格。在所罗门被拐卖初期，他被人贩子们痛打和凌辱，被迫承认自己是逃奴、被迫换上奴衣、被迫舍弃本名、被迫销毁身份凭证，甚至被迫在众目睽睽下洗澡。这一系列行为是白人霸权对黑人男性实施“去男性化”计划的第一步。在所罗门与木匠主管约翰·提比茨的冲突中，提比茨以“黑鬼”“畜生”等语言侮辱、攻击所罗门，甚至对其滥用私刑。他对忤逆者报之以咒骂，对反驳者报之以鞭打，对反击者报之以死刑，极力维护自己的男性气质。讽刺的是，即便在白人权力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主管，也能在黑人男性身上找到优越感。黑人男性的身份降格和被迫顺从被白人至上主义者塑造成父权制定义的女性气质，并不断被传播、强化，进一步巩固了白人的权威和地位。

黑人男性在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面前也尊严尽丧，失去了在女性面前充当“保护者”的权利，男性气质进一步被压制。在电影中，福特与埃普斯分别代表“温和”与“暴力”两种风格。福特采用言语呵斥、心理威慑等方式压制所罗门的反抗意识，而埃普斯使用鞭刑、凌辱等方式来抑制所罗门的身体力量、精神力量。他们自认为白人阶层的规则和逻辑具有绝对权威性，任何质疑、挑战，甚至是形式上冒犯这种权威的黑人，都会被公开惩罚、凌虐。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惩罚常常会公开透明地在黑人女性面前进行，例如影片中帕茨目睹所罗门被鞭打的场景。这种仪式化的惩罚是对黑人男性的性别身份的彻底否定，使他们失去了刚勇的传统男性气质，被迫展现出脆弱、顺从等被白人父权制社会定义为“女性化”的特质，变得毫无尊严。

在白人女性面前，黑人男性也丧失了男人气概的表现空间，例如，白人女性埃普斯夫人警告所罗门：稍有不慎就会挨鞭子。这种规训表明黑人男性在白人女性面前必须保持沉默与服从。更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黑人女性帕茨因被认为有错而被惩罚时，埃普斯夫人命令所罗门亲手用鞭子抽打她。这是典型的白人女性因肤色优越而对黑人女性的统治和掌控，也是黑人男性在复杂的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塑造中的困境：黑人男性不仅不可能充当“保护者”的传统男性角色，还要被迫成为白人女性的权力工具，成为压迫黑人女性的帮凶，从而在一次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违背自己的道义，一步步沦为丧失主体性的他者。白人女性并没有真正地将所罗门当作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她们也不希望所罗门拥有任何自主性和抵抗意识，因为在她们看来，在白人的权力结构中，黑人男性应该永远只是一个工具，甚至不如某些黑人女性。白人女性甚至认为，白人男性必须不断向黑人群体展示力量，以彻底根除其反抗的念头。因此，黑人男性被贬低为“弱小的黑人男性”，个人尊严全无。

所罗门深知，直接的暴力反抗只会像其他逃亡黑奴一样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伪装成顺从的奴隶，在繁重的劳力与精神压迫之余寻找机会逃离苦海。在思想进步的木匠巴斯的协助下，所罗门成功将求救信送至朋友手中，最终被从奴隶制中解救了出来。所罗门的隐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白人塑造的性别意识形态的被动策略，但他最终的反抗则是对这种性别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可以被视为一种被压抑许久的男性气质的最终爆发。

黑人男性气质的压制和扭曲还源于白人的规训机制。白人通过责罚、奖赏和训导等手段，框定黑人男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对于反抗的黑人男性，白人采取直接清除的方式，以维护其绝对权威；对于顺从的黑人男性，白人则通过奖励或降惩的方式来强化这种服从行为，让他们成为支持奴隶制的工具或帮凶。在南下的船上，所罗门遇到了两个黑人男性：一个是具有抗争精神的北方黑人，另一个则是苟且活着的克莱门斯。前者在救黑人女性伊莱扎时被白人刺杀，尸首被弃河中。这是对黑人男性在白人绝对权威之下无力感的形象呈现，同时也说明，在白人面前，任何试图展现自己传统男性气质的黑人都面临付出生命代价的风险。因此，黑人男性面临着两难困境：由于自身尊严、权威与性魅力被白人压制，自己无法成为黑人女性依靠的对象，即使对黑人女性拔刀相助也无济于事。然而，若黑人男性不为黑人女性挺身而出，他们同样也会因为自己的懦弱无能而难以维系自身的男性气质。相比之下，克莱门斯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生存策略。他表现出一种犬儒态度，在黑人女性面前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摇尾乞怜，在白人的规训机制下逐渐被赋予顺从、软弱等“女性化”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克莱门斯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不单纯是他个人的选择，更是被压迫群体内部逐渐分化出来的生存策略。这种策略本身就是白人霸权统治的产物，它破坏了黑人内部的团结，从而使反抗难上加难。因此，在白人的规训机制下，无论反抗还是顺从，这两类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终究都会变形、扭曲。

4. 黑人女性：性别气质的困境

黑人女性的性别气质特点比黑人男性更为复杂。种族、性别和阶级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9]。这一特点在黑人女性的双重工具化中有所体现：她们既要保持女性原有的气质特征来满足白人男性的性欲望，又被迫展现相当多的男性气质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除了遭受白人男性的压迫，黑人女性还要忍受白人女性的嫉妒、欺压和边缘化。

与白人女性不同，身为黑奴的帕茨不得不对白人男性埃普斯低眉顺眼，同时她凭借优秀的采摘能力，有着出众的经济价值。她的温顺性格与强大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对埃普斯而言，成功征服这个既强大又极具女性魅力的帕茨，不仅能在众黑奴面前彰显自身的权威，还能压制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来突出自身的男性魅力。埃普斯对帕茨的性骚扰不仅发生在夜晚，他还会在安息日时刻关注她的动向，对所有靠近她的男性都报以敌意，反映白人男性企图通过身体暴力来巩固自己性权利的心态。同时，黑人女性被塑造为强悍且能干的劳动者，她们的身体因此被合理化为能够承受高强度劳动的资源，以便于种族资本主义的剥削。例如，像帕茨这样具有出色采摘能力的黑人女性就被称作“采摘女王”，但这一荣誉并未带给她实质性的地位提升，反而成为白人男性借此操纵黑人男性竞争心理的工具，从而提高黑人男性的劳动效率，为白人带来更多利润。黑人女性被迫过多展现的男性气质特征，还被用来压制黑人男性的尊严，因为与女性相比较更能削弱黑人男性的男性气质。而白人男性则自始至终保持最高权威，拥有最强的男性气质。

对黑人女性进行种族化性别意识形态塑造虽有利于白人男性，但也让白人女性感受到了威胁和不安。帕茨身上顺从的女性气质让埃普斯夫人心生妒火，为了维护自己作为白人女性的优势地位，埃普斯夫人使用了许多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毁坏帕茨的容貌、没收肥皂，以及施用身体暴力，来削弱帕茨的女性魅力。从埃普斯夫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她认为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女性气质是此消彼长的，通过削弱帕茨的女性魅力，自己的女性魅力便得到增强，证明自己更符合白人男性定义的标准，进而赢得白人男性的庇护和认同。埃普斯夫人即使有着优越的白皮肤，但她同时作为女性，在父权制体制下生活往往身不由己，她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但是，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促使她成为种族不平等体系中的帮凶，她同时也是种族主义的施暴者。于她而言，伤害帕茨既能平息自己的妒火，又能警告丈夫，是她在维护自身在父权制体系内相对优势地位的策略。为在不平等体系中获取相对优势，权力结构内部较为弱势的群体会对更为弱势的群体进行压迫，恰好符合统治者“分而治之”策略的利益，也说明边缘群体更容易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社会的不平等氛围因此被不断复制，形成恶性循环。

帕茨展现出的顺从的女性气质引发了白人女性的嫉妒心，她所具有的独立和自主意识也使她遭受到了白人女性的排斥和边缘化。帕茨拒绝埃普斯的性要求，这理应符合埃普斯夫人的利益，但居然反而遭到她的嫉妒。因为帕茨展现出的独立与勇敢，不符合包括埃普斯夫人在内的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所期待的“低等”人格设定，不利于白人女性种族优势的发挥。帕茨对所罗门示好，是她在黑人社群内部展现自己女性气质的一种方式，这也与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期待相悖。因为这是对埃普斯男性尊严的冒犯，是对白人男性权威的挑战。在白人男性主导下，黑人女性的身体和情感可随意被支配，帕茨的独立自主意识远远超出了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容忍范围，加剧了这种双重压迫。

除帕茨外，被迫与子女分离的黑人女性伊莱扎和委身于白人奴隶主的肖夫人也难逃他者化的牢笼。肖夫人为换取优渥的生活条件，选择牺牲色相，只敢暗中诅咒白人奴隶主肖。相比之下，伊莱扎的勇敢和智慧展现了她作为母亲的坚韧与不屈，成为极具正能量的黑人女性形象代表。她曾在船上遭受男贩子的侵犯、羞辱，被卖到福特家后又被迫离开自己的孩子，在布道时因过度思念孩子，破坏了布道氛围，最终惨遭杀害。她曾屈从白人男性主导的奴隶制体系，成为男主人的情人，但在男主人去世后，她和孩子被卖到了南方，这一变故促使她开始与命运抗争，随时随地为孩子哭泣。尽管她力量微薄，却点醒了所罗门。与伊莱扎的交流不仅让所罗门认清了奴隶主的本质：让黑人男性丧失男性气质，沦为顺从的工具。还扰乱了白人男性福特所构建的以白人奴隶主意志为核心的精神体系，而伊莱扎的死亡则成为他开始身体力行进行反抗的导火索之一。

性魅力与顺从曾导致伊莱扎变得不幸，但女性气质中的母性又激起了她的反抗精神，使她展现出强大刚勇的男性气质。不同于帕茨，伊莱扎身上那股强烈的男性气质是被母性激发出来的，并非是被种族资本主义所塑造。由此可见，女性气质并非总是与男性气质相悖，女性可以展现男

性气质中的英勇与韧性，男性也可以拥有女性气质中的温柔与细腻，性别气质的融合是人性的自然体现，不应被任何性别意识形态束缚。但遗憾的是，伊莱扎也未能冲破以白人男性为核心的奴隶制体系。在失去白人男性的庇护后，她沦为了白人女性的奴隶。

由此可见，黑人女性无论被塑造出何种性别气质，都将成为白人巩固自身权威的牺牲品，难以逃离种族、性别与阶级三重压迫。

5. 流行文化中的性别凝视与种族话语

电影《为奴十二年》通过构建黑人“女强男弱”的性别意识形态，契合了西方观众的道德立场与情感期待，这表明西方以“东方化东方人”为目的的“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在流行文化中不断被重构与再生产。

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定义本身就存在刻板化问题。男性气质通常被刻板地与力量、果断、保护和主导等特质绑定，而女性气质则与温柔、顺从、关怀和从属等特质相联系。这些刻板印象被进一步以隐蔽却有力的方式固化和利用。流行文化，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常通过顶级男演员的女性化装扮来固化黑人男性传统男性气质微弱的形象^[10]。黑人男性因而被塑造为“无能”“软弱”的模样，被遮蔽了人格的真实性和多样性。黑人女性则面临被社会和媒体过度男性化的困境，常被认为是强壮的、好斗的、吵闹的和争强好胜的^[11]。她们被刻板地描绘成肥胖和过度男性化的形象。^[12]而非白人女性在角色改造过程中也被刻意塑造成符合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形象，被描绘成狂野、性开放，成为被贴上“怪胎”标签的对象^[13]。由此一来，黑人的性别表现便被有意地与白人的性别秩序相比较，服务于白人统治与剥削的合法性。因此，黑人女性作为他者，成为白人奴隶主的“女性景观”，她们的身体意识和主体意识在白人凝视下逐渐削弱；黑人男性则成为白人权力的载体，承受“全景敞式凝视”下的肉体和精神折磨^[14]。

从制作策略和摄影技术层面看，电影往往与男性中心主义或父权制结盟^[13]。在《为奴十二年》中，黑人男性无法获得在父权制中作为正常男性应具备的“保护者”“提供者”等男子气概。他们既无法通过展示传统的男性气质而获得认可、尊重，也无法通过抵抗白人权威而恢复男性气质。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压迫还会导致黑人男性将不满情绪宣泄给黑人女性^[15]，而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并非出于黑人男性自己的意愿，而是白人父权制压迫的向下转嫁。

萨布丽娜·斯特林斯（Sabrina Strings）认为，黑人女性的身体遭受着父权制与种族主义的双重异化，将肥胖污名化为粗俗的、不道德的，以此贬低黑人女性，有利于推动精英白人女性主流审美中的苗条身材成为正确的身体形态^[16]。虽然父权制常常将女性气质与“顺从、柔美、脆弱”等特质捆绑，但实际上，父权制并非简单地以同一个模版定义所有女性，而是根据情况给不同种族的女性贴上不同的标签。具体而言，父权制将黑人女性体魄上的“坚强”“坚韧”等特质当作她们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特征，而不是对压迫环境的适应性结果，遮蔽了他们背后所承受的结构性压迫。这直接服务了种族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既然黑人女性本来就很强大，她们的身体理应能够承受高强度劳动。更糟糕的是，由于黑人男性处于弱势地位，黑人女性往往不得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这使得她们身上本就被本质化了的男性气质更加突出，巩固了白人的压迫逻辑优势。在电影《为奴十二年》中，黑人女性在外要承担繁重的田间劳作，在内要当家庭中的经济支柱，这符合白人男性对黑人性别意识形态的设想。这充分说明，性别气质其实是流动的、不断被建构的，所有被固化的标签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便于区隔不同的群体，并掩盖权力结构的不公。

通过对黑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形象的深入分析，柯林斯总结出好莱坞电影中所体现的黑人性别意识形态的三个显著特点。首先，文化差异是维持种族边界的关键因素；其次，黑人性别意识形态呈现出黑人男性柔弱、黑人女性坚强的特点，与白人社会的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性别意识形态为种族不平等提供了借口，同时阻碍了黑人的反抗^[17]。黑人性别意识形态被定位为白人性别意识形态的对立面^[1]。因此，白人得以将黑人群体内部受损的价值观视为种族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当这种黑人性别意识形态被他们自己内化时，便会促使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相互指责，从而消除了种族歧视的存在与影响。在这种逻辑下，特定阶级的性别意识形态成为解释黑人贫困持续存在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便利工具^[17]。因此，白人成功构建了一个种族歧视逻辑：当黑人群体的性别意识形态与白人主流规范完全颠倒时，便证明了其“文化劣等性”，从而为系统性压迫披上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合法外衣。

6. 结语

电影作为重要的流行文化载体,在反映历史现实的同时也塑造着种族和性别话语。主流媒体对黑人群体性别意识形态的刻意塑造,会无意间迎合、延续白人的霸权逻辑,加剧了种族与性别不平等。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要避免给黑人贴上各种本质化的标签,并防止将黑人的价值框定在白人设定的规范当中。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是要求黑人达到某种既定的标准,而是承认性别与种族的流动性、多元性。因此,黑人群体无需通过迎合某种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相反,媒体应该更真实地呈现黑人群体在人格和性别气质等方面的多样性,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表达空间。只有消除对黑人群体种族化的性别凝视,才能推动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和性别平等,以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和美好的社会。

参考文献:

- [1] WYATT J. Patricia Hill Collin' s Black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Genealogy of the Strong Black Woman[J].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2008, 9: 52-67.
- [2]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 2011, (01): 118-127+159-160.
- [3] 赵俟,张学丽,张辉.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他者”[J].文艺评论, 2014, (05): 38-42.
- [4] SAID E W. Orientalism[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3.
- [5] SARWAR G, YAMEEN F, AIN Q. Review Of the Book âOrientalismâ By Edward W. Said[J]. Jahan-e-Tahqeeq, 2024, 7(1): 1300-1315.
- [6] 杨月妮,吴群涛.主流话语对“他者”的塑造——论鲍勃·迪伦的歌曲《埃米特·蒂尔之死》[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3,36(02):72-78.
- [7] FANON F. Black Skin, White Masks[M]. Charles Markmann, trans. London: Pluto Press, 1967.
- [8] ELLIOTT M. Reflecting the Man: Gendering Race in Paul Haggis' s Crash[J]. Canadian Journal of Film Studies, 2017, 26(02): 117-133.
- [9] 康奈尔. 男性气质[M]. 柳莉, 张文霞, 张美川, 俞东, 姚映然,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2.
- [10] TART T T. The Emasculation of the Black Male Image: Building a Better Black Man [EB/OL]. The Linkedin. com. 2018-1-29.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masculation-black-male-image-building-better-man-timothy-tart/>.
- [11] ARANA B. The Masculinization of Black Women [EB/OL]. The Nubian message.com. 2022-4-14.
<https://www.thenubianmessage.com/2022/04/14/the-masculinization-of-black-women/>.
- [12] KATE N, THREADCRAFT S. Perceiving the Black female body: Race and gender in police constructions of body weight[J]. Race Soc Probl. 2015, 7(3): 213-226.
- [13] HOOKS B. Reel to Real: Race, Sex, and Class at the Movie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4] 黄涛.从被凝视到反凝视: 电影《为奴十二年》中的黑人身体研究[J].新余学院学报, 2018, 23(4): 100-103.
- [15] HOOKS B. Ain' 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105.
- [16] STRINGS S. Fearing the Black Body: The Racial Origins of Fat Phobia[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9: 7.
- [17] COLLINS P H. Black Sexual Politics: African Americans, Gender, and the New Racism[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